

给我狭窄的心，一个大的宇宙

——冯渊《夜路温柔》序

张新颖

写活那朵党史中的“红玫瑰”

华明玥



《夜路温柔》冯渊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

冯渊与我，都是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，客气一点说，渐入老境。可是前不久我见他，禁不住脱口道：你怎么还这么年轻？

我说他年轻，还不只是说长相，而是整个人散发的气息。

读《夜路温柔》这本散文集，我慢慢琢磨出一点道理：冯渊这个人，宽厚的身体里，还住着他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；不但住在里面，还活跃不已，能量充沛。这样的人，要不年轻，也难。

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，写的是从小时候到二十岁出头之前的事情，大致上可以概括为“少年冯渊的世界”。既称为“世界”，就不单单是一个人，而是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切所发生的种种关系。

一个少年，他的世界能有多少东西呢？如果有这样的疑问，正好来读这本书。

这个少年有个强项，会感受，这是和周围世界发生关系的启动点。这话说的，是个人就会感受，算什么本事？人和人还真不一样。感受，把这个词分开了讲，是感而能受，感知的能力不一样，接受的能力也不一样。从感知到接受通畅了，才可能得到周围世界的滋养。更进一步，是感应，不仅仅停留在接受的阶段，还要起而应之。要应，就得有自己的东西。对于一个少年来说，自己的东西不是现成的，他得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去得到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从触发处见生机，一点一点生长出来。这么说显然太抽象了，而具体地、生动地、细致地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多种情境，在《夜路温柔》这本书里有很动人的呈现。因为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少年的世界非常丰富。

这个少年自己，却常常觉得他的世界太过狭小，他敏感于各种渠道的有关外面世界的信息——他早早地意识到外面有个更大的世界，他对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保持着强烈的渴望。他喜欢阅读，既为满足这种渴望，更刺激了这种渴望。

所以“少年冯渊的世界”既是他周围和他发生切实关系的世界，也包含他渴望走向的那个远方的世界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他的渴望没有吞噬他对周围生活世界的丰富感受，二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。而是关联、连接、接续。

“给我狭窄的心，一个大的宇宙”——这个少年，就这样敞开着心，慢慢成长起来。

我曾经把冯渊的文章推荐给朋友，他看了之后说，这个人记忆力怎么那么好？怎么记得那么多，那么细？

这本书里的文章，都是五十几岁之后写的。隔了三十年、四十年的漫长时间，回望青春和少年，确实有个记得不记得的问题。有的人记忆力超群，有的人记忆力糟糕，天生如此，不必讨论；但除去天生，记忆还有后天的运作，给个人留下空间。他记得那么多而细，是他的记忆力想要记得那么多，记得那么细。为啥？因为经历的人、事、物，和他都有关系，他对这些都有感情。这话听起来没有什么意思，其实关键正在这里。我经历了某些事，但很可能觉得这样的经历对我没有一点影响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当然更谈不上感情，日久年深，忘了也很自然。没有关系，没有感情，怎么记得住？所以，冯渊的好记性，有个支撑，源自他对过往经历的关系，对过往经历的感情。这关系，这感情，有多深呢？没有过往的经历，就没有现在的自己，你说这关系和感情有多深。

他在记忆里重现过去的情境，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；如果不是现在写，假设当初经历时就写，会是现在这样的文章吗？不会。差别就在于记忆这东西。有了记忆，有了记忆的发酵，有了记忆的生长——别以为记忆是个固定死了的东西，记忆有生命，会生长——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文章。流动的时间，转换的空间，给记忆生长以条件。说得再复杂一点，后来的经历，就是那个少年渴望走进去的更广阔世界的经历，也滋养了早先记忆的持续生长。

也因此，《夜路温柔》不仅是少年之书，也是记忆之书。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，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，隔着岁月互相打量，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；这层次中间，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，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联结、更浑然的一致。

一本丰富的书，序言就可以写得简单。但我想多说一句，说它的语言和叙述之好。好在整体，表现于多个方面，不展开说了。我也不去找特别的段落，随手抄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：

我的村子叫冯家塆，1954年大水，许多人家都淹了，村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淹。地基高，畈上的稻田变成了汪洋，村子还在塆上。塆，田边的土坡。

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包含了那么多信息：村庄的历史遭遇、地理环境、农作物、大小和样貌，如画在眼前。还顺便解释了一个字，表明村庄的相对位置——冯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，这习惯，不管他这里是无意还是有意，都很自然，而且让人觉得亲切，是不？

但这只是开始的地方。一本书，一个人，从这个小小的“塆”上扩展，这扩展的过程才是这本书、这个人的“世界”。



“茫茫四海景无边，任意遨游眼界鲜。唯嗟世事如麻乱，弭祸从今待后贤。壮志英雄愿未尝，喜看大地又回阳。从今不作经营计，愿与农民论细详。”

这天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、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，化名张炳，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围，带着100余名红军战士前往揭西大洋，去挑部队急需的大米。路上，他们在“卢龙庵”歇脚，尼姑慈悲善目，立刻为这些走得大汗淋漓的人端来茶水。此时，古大存偶然发现，尼姑庵正门的墙壁上，有一首别人手持木炭题写的诗，打头的一句是“卢龙庵畔景无边”，落款是“五华胡谦光”。老尼介绍说，这位胡先生是一位文人雅士，爬山到此，写了这首七律，说谁能对上他的诗，重重有谢。但他留下这首诗很久了，竟无人能对上。

于是，正在险恶的被围剿环境中艰难求生的古大存，立刻拾起一截木炭，贴着胡先生诗作的声韵，在墙壁上刷刷地写下上面这首诗。

以上，是王国梁的长篇纪实小说《红玫瑰》中的一个动人的细节，短短八句诗，将这位老农打扮的将军对世事的观察，对局势的把控，对农民苦痛的体察，以及对革命前景的乐观态度，一气呵成，倾注笔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诗，并非创作于局势平稳的环境下，而是创作于反围剿的局势越来越严峻，古大存与红军战士即将分散突围的时期。当年，红十一军的英勇战斗，牵制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近十万大军，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应对五次围剿的压力，成为“中央苏区的南方屏障”。1934年，在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之后，古大存与他的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，他不得不忍辱负重，见机行事，带领红军战士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茫茫群山间展开游击战。他作为一名老战士，一名肩负保存部队有生力量重任的指挥官，竟有闲情逸致写下一首诗，可见他心理上的坚韧、强大与平静。而在诗作中，他不但抒发了“待后贤”“又回阳”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还非常机警地在诗中隐匿了自己的身份与来历，避免给为战士们奉茶的尼姑带来危险。

长篇纪实小说《红玫瑰》，是作家王国梁“用脚写作”的又一丰硕成果，为让这段掩埋在档案馆里的东江史诗带着它的体温走向读者，王国梁在写作的筹备阶段，就决心要“用脚丈量古大存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”。他不辞劳苦，和古大存之子结伴，从2018年起，历经三年，沿着古大存当年奋战的足迹，跑遍了东江地区的7个市、20多个县，实地前往100多个村庄采访和收集史料，连“卢龙庵”这样的偏僻之地也不放过。而后，王国梁采用了一种类似“连续剧”式的写法，不仅从古大存一

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战斗经历出发，写出了他用奇兵化险为夷的策略，对局势精准预判且先发制人的机敏，写出了他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身先士卒，想尽一切办法为部队筹集大米、食盐、弹药的艰辛，也写出了他在被左倾思潮排挤的愤懑，最后带领仅剩的17名战士在深山老林里继续战斗的坚韧……最终还原这位传奇红军将领“能文能武”“机敏过人”“警觉睿智”的鲜活形象。

王国梁五易其稿，花费6年，从主人公所经历的亲情、爱情、乡情出发，刻画出古大存这位被毛泽东誉为“带刺红玫瑰”的革命先辈，果敢有勇气，真诚有信念，临危而不惧的性格特征，同时，也精心刻画了他的战友们，包括李斌、古宜权、徐妙娇、张剑珍、李三妹等革命志士的丰满形象，并在生动的故事中，融入粤东地域文化元素。客家方言、山歌民俗、仙姑崇拜等属于东江地区的独有文化，在本书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，而是与古大存的战斗故事紧密结合，是历史褶皱中情感与温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这些富于当地特色的乡俗细节的存在，为历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富有人情味的视角，让阅读体验变得酣畅淋漓。

《红玫瑰》这本长篇纪实小说，牢牢抓住主人公十年命运沉浮的主线，聚焦其在孤军奋战的艰难时刻，依旧守护其誓言与信心的一系列抉择，将古大存与战友们信念的坚定、爱情的炽热、友情的温暖、乃至牺牲的惨烈与悲壮，都融入了细腻可感的故事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之中。这本书的鲜活可读，也为纪实性红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：停留在史料的借用和铺陈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若想让那些沉睡在档案中的名字重新呼吸、呐喊，重新走到我们面前，必须用文学的刻刀，精心雕琢主人公的每一个选择，雕琢人物的灵魂，挖掘那些忍痛诀别的心灵震颤，久别重逢的情感浪涛。唯有融合史笔的严谨与文学的温度，让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与精神力量穿越时空，抵达当代读者，封存在历史中的“红玫瑰”，方能重新绽放。



《红玫瑰》王国梁 著
团结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